孔子三泣

□郭小琲

“男儿有泪不轻弹”大概是中国男人受到的第一性别教育。可近读《论语》发现孔子曾有流泪，而且不止一次，还当着众弟子的面，以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被记入典籍。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一个其智若圣的男人缘何流泪？

《论语》有两处记述了孔子的哭泣，其中一次是为丧主。“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临丧哀，不甘。日哭，则不歌。”孔子早年曾治丧礼，他主持的丧礼应该很多。可如何一遇丧主在旁便食不甘味并哀伤哭泣？这也太没有职业水准了。即使“丧，与其易也，宁戚”。那也应该是丧主悲戚，何至专业主持“哀”而“日哭”？

那一定是触碰到了孔子的痛。

史上有一哭丝毫不逊孔子。“舜往於田，号泣於旻天。”舜为天子曾跑到野外对着苍天放声哭泣，这又为何？孟子解其故，“怨慕也”。3岁丧父的孟子将心比心很容易就读懂了圣人的号泣。原来皆为“怨己之不得其亲而思慕也”。舜，“五十而慕者”，是天下首孝。同理孔子“终身慕父母”亦当是大孝。3岁丧父，17岁丧母的孔子心中一定贮藏着潮水般不停涌动的追慕之情，尽管他魁梧高大且有“岁寒松柏”的刚毅坚强。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凭借《蓼莪》的失枯之痛我们不难体会孔子的“哀”“哭”。每有丧主在旁孔子的思亲之绪便会砰然而至。那一日孔子食不能饱腹，味不能甘甜，一个酷爱音乐的人一整天都不再歌唱。那一日，他像从一条悲伤的河中走出，整日滴着思亲的泪水。这让两千多年后的我唏嘘不已。孔子“遇”丧则哀，悲则便哭，这不是仅有“丧事不敢不勉”的职业态度可以做到，也非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能够圈点。一定是将每一个生命都浸润在他博大的胸怀中了。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爱自己的父母是最重要的。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又如何去爱他人。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世道理从流着思亲泪水的孔子口中说出时，我们真切感觉到他推己及人的真诚笃实。也才深刻领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话语中的恳切期待。有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理想宣言的孔子告诉人们，君子知天命，仁者要“爱人”。孔子的哲学从来都不空洞和抽象。所以哭泣是“仁”的事，不哭定是“不仁”的事了。我想刘邦断不会哭的。项羽声言要拿他的爹熬肉汤，他居然戏称可以分一杯羹。杨广也不会哭，否则不会弑父杀兄。在他们心里，亲情大不过一国之利。而一旦眼里只有利哪里还会有泪。一个没有了眼泪的人又怎能是一个真正的人。

《孔子家语》和《左传》都记载了孔子的又一次哭泣。子产卒，孔子闻之泣：“古之遗爱也！”子产，孔子闻其名未谋其面的郑国宰相，一个执意改革的政治家。他离世的那一年孔子30岁。30岁的孔子可还没有接受南宫敬叔两兄弟随其学礼，授徒讲学的伟大生涯还没有开启。30岁的孔子也还没有适周拜会老子，虽鲁人皆知“鄹人之子知礼”，可问礼的计划已在酝酿。30岁的孔子尽管有了“委吏”“乘田”的历练，但还没有机会向齐景公说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世名言，虽然他的仁道思想学说已经确立。30岁的孔子饱足了精神，蓄势待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勉励君子的同时，孔子也勉励自己。一切都正在起步的孔子多么希望有更多的力量彼此呼应，结伴而行，共同挽救礼崩乐坏的世道。郑国子产、齐国晏子在孔子看来都是施行仁道的种子选手。尽管子产铸刑鼎，孔子观点与之相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孔子以为刑与法管得了身管不了心，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而“礼”可以明德，德可以明心，心明了身自然可以正。孔子一身的事业尽在修身。但修身不是目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孔子真正想要的。孔子与子产的目的一致。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子产“宽猛相济”，显效郑国，孔子便称美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认为子产不论修己还是治人都称得上敦伦笃行。子产古道遗风，像一面镜子，折射上古风景；又像是一颗火种，给人以希望。可这面镜子碎了，这颗火种熄了。“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死后，“国人哀亡”。孔子则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空寂，以致不免“出涕”。这一次孔子的泪水与私情无关，而只关乎理想，关乎仁道了。

《论语》还记载了孔子晚年的一次哭泣，为颜回。颜回早死，69岁的孔子动真格地大哭了一场。泪肆无忌惮地流，以至一旁的人见了不知所措，“子恸矣”。孔子泪眼迷蒙地问：“我伤心了吗？我哀伤到了极点，不自觉就哭成了这样，我不为这个人伤心还能为谁伤心呢？”颜回的死像是在孔子的心上扎了一把尖刀。“吾道之穷欤。”他仰天长叹：“噫！天丧予！天丧予！”那一刻，已是风烛残年的孔子一定感到阵阵眩晕，如濒死般窒息。

颜回的死，对于孔子不啻于是又一次的丧子之痛。68岁时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死，《论语》并没有记载他的悲伤，只记载了孔鲤之丧有棺而无椁。仅隔两年，那个13岁入师门，“于吾言无所不说”又“视予如父”的颜回先他而去，垂垂老矣的孔子着实不能自已。颜回就像他的一个影子，“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颜回“闻一知十”，孔子喜爱不禁，对子贡说：“弗如，我与汝弗如也。”全不顾子贡是否能承受得起。颜回又是那么不可或缺，“自吾有回，门人益亲”。令孔子“不亦乐乎”。周游列国时，不论是在陈绝粮，还是于蔡被困，颜回都陪伴在他的左右。在匡地颜回曾与大家走散，孔子心急如焚，对追上大伙的颜回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颜回竟像膝前尽孝的孩儿一般回答说：“子在，回何敢死？”一句话说得孔子心里暖洋洋的。可语声盈耳，晚生已逝。暮年的孔子再一次感到四顾茫茫的孤独和寂寞，还有突然袭来的绝望、悲伤，泪水又怎能不肆意流淌。

当然，孔子之“恸”不独这感人的师生情。有复圣之称的颜回仰慕夫子，追随夫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几近圣道，“虽数空匮而乐在其中”。孔子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重要的是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在孔子的眼里颜回最接近理想人格，“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于是孔子向颜回讲述了自己最重要的思想观点，“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等于是把自己的梦想托付给了颜回。孔子预想着自己百年之后颜回掌门可以继续未竟的追求。颜回成了孔子人生的最后安慰。可颜回骤然离去，这让孔子猝不及，又是多么残酷的打击。“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今也则无。”心力劳瘁的孔子无法抑制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悲伤，也无需抑制无需掩饰，泪水尽管奔泻。让两千多年后的我们顺着这泪水的痕迹就读懂了孔子，而不只是把他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

颜回走后不久这位至圣先师也走了，仅仅过去了4年。

有所思

张之洞治山西

□任九光

清光绪七年（188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时年44岁的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一到山西，张之洞即发现完全出乎意料。原本富庶的山西，受中俄贸易等原因影响，晋商已呈衰落势头。1877年山西全境大旱，粮食绝收，民间普遍靠草根树皮度日，个别地方甚至“易子而食”，而朝廷赈灾不济，赈灾粮款被侵吞挪用放贷，民间元气一直未恢复。所谓的山西“政清事简”，竟是官员自身懒惰昏庸的托词。前几任巡抚或不理政事，或昏庸贪腐，或廉洁但懦弱，导致全省官场吏治腐败，风气懒散。多年积习传染导致的“懒”“散”二病遍及山西全省，官民同病，“懒、散之极，将有鱼烂瓦解之忧”。

除通省懒散之外，张之洞还深切忧虑到，“晋患不在灾而在烟”。当时山西民众普遍吸食鸦片，“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除吸食鸦片外，山西全省还大范围种植鸦片，1877年山西大旱饿死人数众多，部分原因也在于山西土地多种罂粟而非粮食，遇灾荒后农民手中有钱无粮而造成。

以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立身的张之洞面对此种情况，不畏众人非议，从整顿吏治和作风入手。张之洞以巡抚身份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考察干部，要求全省各级官员在半个月内，将对下属的奖惩意见配合具体的实际业绩报送巡抚衙门，并特意强调要务求实际，不能以官场套话应付。同时，张之洞发挥自身表率作用，坚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每天丑正二刻（凌晨两点半）起床，寅初（三点）批阅文件，辰时（七点）约谈下属官吏，根据上级评价和自己判断来了解官员。此外张之洞还将家丁从三名减至两名，负责全部文书收发管理、引见接待宾客、外出跟随等杂务，来压缩财政开支。面对张之洞整顿作风的举措，山西官场如遇地震，习惯了巡抚尸位素餐任事不管的各级官员众议沸腾，对张之洞“多事”之举大加指摘。“省城局面，大有联为一气，口众我寡之势”，明里指责张之洞不合儒家治理思想的舆论压力，加上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等人暗里纠合亲信使绊子打横炮的阻力，使张之洞治理整顿的第一步就面临严峻考验。

面对众口一词的压力，张之洞“咬定青山不放松”，以“天人战胜，看此一两月耳”来坚定信心，毫不动摇推行整顿。对于暗处的阻力，张之洞启用李秉衡、马丕瑶等廉明官员，委以重任，“一人兼二事，甚或三事”，强力推进自己的治理举措。张之洞上任4个月内，共上奏朝廷保举贤良人才59人，自己考察发现的操守廉洁、勤政爱民、赈灾得力的官员直报朝廷予以嘉奖，用选拔干部的正确导向来辅助整顿。同时，张之洞查明旱灾以来贪腐、克扣、扰民、昏聩等官员9名，上奏朝廷予以革职至降职不同处分，大大震慑了暗中使坏破坏整顿的葆亨等小集团气焰。经过不到半年的励精图治，张之洞逐渐扭转了官员的懒散作风，走出了最为艰难的困顿时期，认识到“晋事大有可为”，“今日之晋，虽不能为强国，足可以为治国，断不至如从前之颓墙倒壁、乌烟瘴气也”，“朝廷若假以三年，当为国家治之”，展现出对治晋图强的强烈信心。

经过初步整顿之后，张之洞于任职半年之际，向朝廷上《整饬治理折》等五封奏折八份附片，系统汇报了自己治理山西的执政思路，其中包括养民务本、养廉课吏、去蠹理财、辅农兴利、重士善俗、固围图强等六个方面二十种具体举措，展现出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特点。在整肃吏治方面，张之洞发现官员贪腐不尽职，不计官职高低一并查处。针对山西省财政账目胡乱不堪的情况，张之洞选派清明廉洁官员负责成立清源局，逐笔清理30余年未清理的财政账目。清查中发现藩司葆亨和冀宁道王定安存在贪腐行为，张之洞毫不顾忌二人为当时朝廷红人、两广总督曾国荃的亲信，而上奏朝廷将二人革职充军。有一个黑恶势力粮油商人刘定邦（纳捐得游击衔，从三品，无实职），张之洞发现他雇用打手强买强卖等不法行为，下令将其秘密逮捕，查明罪行后革职充军，一并扫除这一黑恶势力。除此之外，张之洞先后上奏朝廷，对屡发盗案而不能尽职破案的地方现任和前任文武官员11名分别给予严惩；革职查办对私自侵吞税款的官员3名；降职处理4名不法绿营武官。对于发现的不法官员，即使已经调任外省，张之洞一并上奏朝廷，要求他省协作抓捕后回晋治罪。

针对山西全省的烟患，张之洞特意研究制订了系统的禁烟措施：一是帮助烟民戒烟。效仿李鸿章在天津设戒烟局的做法，大量购买戒烟药品免费发放。二是严禁种植。明确严禁种植罂粟的同时，根据各地情况由农民自行选择种粮、棉或经济作物，对特别困苦的农民免费提供粮种。三是亲自抓落实。逐一过目各县报告，逐一批示，并反复组织州县之间互查。如对嶓县与其所属代州上报不一致之情况，张之洞要求该县令亲自查访，不能单纯相信乡保的保证，并指出“该令向有笃守积习，自系聪明之病，毋再以此尝试也”。又如对繁峙县报仅种数亩的情况，批示“该令素欠精明，大率听信丁役欺己之言，因即用以欺骗上司耳。现委雁平道往查，务得实在。该令好自为之，勿以多年读书辛苦之官，弃之于‘昏、惰’两字也”。由上述批示也可见张之洞对各县县令性格的了解熟稔程度。四是奖惩并举。张之洞对禁种成效突出的官员优先保举，对初办不积极、经督查后才尽力的进行警告，对承办不力的留用察看，对虚报瞒报的请旨撤任。五是立足实际不急功近利。张之洞上奏朝廷指出，从各地上报情况、本省戒烟药物销量和外省进入山西之鸦片数量综合判断，全省总体禁种80%，如能同心协力坚持，“三年以后，可期此害永除”。

对于治理山西的举措，张之洞自称是“儒术经常之规”，意思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治理方法。经过实际推行，山西省财政比清查前增多白银七万余两、核销欠款五十万余两，账目混乱之弊一应扫除，财政负担大大减轻。后御史建议朝廷在全国推广山西清查库银的章程做法。作风整顿建设方面张之洞裁汰陋规，改革公费报销制度，禁止馈送官员水礼等，仅第一年一次就裁减巡抚衙门办公经费一万九千余两和伙食补贴六千两，将全省办公经费逐项研究进行裁减，一并废除“查库门包”等陋习，贫苦州县全免原来负担的山西省公费，非贫苦州县将原承担公费份额减半。经统计全省上下仅裁减公费一项全年节省开支七万八千余两。在养民抚农方面，张之洞根据山西承担差徭、摊捐等情况，在全省以鱼鳞册清查土地，上奏朝廷前任地方官员虚报垦荒田亩数量的情况，以减免百姓钱粮差徭；清理全省负担各类朝廷摊派，请朝廷允许以地方赋税折抵山西应上交朝廷之平铁五年，不再向山西摊派本地不再出产的绸绢纸张。在张之洞与山西官民的共同努力下，山西人民之负担大大减轻，旱灾所伤的民众元气也逐渐恢复。

中华春秋

“礼仪导演”叔孙通的功过

□陈 良

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秦末，陈胜在山东造反。使者向朝廷告急，秦二世随即召集博士儒生征询对策，30多名博士儒生认为臣子造反罪不可赦，建议火速发兵清剿；秦二世听了，一脸愠色。叔孙通走上前对秦二世说：“如今天下合为一家，郡县城池早已扫平，所有兵器都被销毁，告示天下不复使用。况且当今皇帝英明，法令完备，官员尽职，四面八方如辐辏一样归心朝廷，哪里还有什么人敢造反呢！那些闹事的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之徒，实在不足挂齿。责令各地郡守县尉抓捕查办，便高枕无忧！”秦二世转怒为喜道：“好。”叔孙通说话中听，秦二世特地予以嘉奖。

尽管受到皇帝的嘉奖，但叔孙通还是赶紧逃亡，因为他自知那番话纯属忽悠，迟早会露馅的。等他逃到故乡薛地，薛地已投降楚国起义军；义军首领项梁来到薛地，叔孙通就跟随项梁闹革命。项梁在定陶战败身亡，叔孙通又投奔楚怀王。楚怀王被封为“义帝”迁往长沙，叔孙通就留在项羽身边当下属。汉纪元二年（前205年），刘邦随五路诸侯攻入彭城，叔孙通转身投靠刘邦。刘邦被项羽打败向西逃窜，叔孙通也跟着刘邦一道西行。

汉纪元五年，刘邦统一天下，做了皇帝。刘邦原想废除秦朝仪法，责成叔孙通制定一套礼仪，简便易行即可。立国之初，大臣们在宴会上喜爱饮酒争功，狂呼乱叫。刘邦非常恼火，碍于出生入死的战友情面，又不便发火。叔孙通看透皇帝的心思，主动建议：“儒生虽不能为陛下打天下，但可与陛下守成。臣愿意前往鲁地找一些儒生，让他们与我的弟子共同制定一套朝会礼仪。”叔孙通还从三皇五帝说起，讲到夏、商、周、秦的礼仪，表示要在采集古礼与秦仪基础上推陈出新。刘邦当即点头，同意他尝试，但力求简易，别整得太繁难。

于是叔孙通担当总导演角色，马不停蹄地张罗。他先是跑到孔子故乡招聘30多名儒生，既彰显他们来源的“正宗”，又充实自己的阵容。当时有两位儒生拒绝合作，并揶揄叔孙通：“您老人家真是奇葩，侍奉过十来个主子，总能靠阿谀奉承博得主子宠爱。如今天下刚刚安定，您就搞起什么礼乐。礼乐的兴起，那是行善积德百年以后的事情。您现在搞这一套，是不合于古制的，我们不愿跟您一起掺和！”叔孙通笑道：“你们可真是腐儒，不懂得顺时应变。”

回到长安，叔孙通把新征的30多人与刘邦身边的书生及自己的弟子整合起来，组成一个团队，在野外安营扎寨。团队的最高任务就是制定并排练朝会礼仪，各人扮演相关的角色，依照总导演号令行事，群众演员不够，就立草人凑数。大家餐风宿露，演练一个多月。

汉纪元七年，长乐宫建成，“朝会”大戏于十月隆重上演。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盛况：天亮之前，司仪引领诸侯大臣依次进入殿门，两边布置保卫宫廷的骑兵、步兵，各种兵器陈列，旌旗招展，气氛威严。听到司仪传令：“趋！”殿下的郎官们齐刷刷站到台阶两旁，每个台阶上都站着数百人；功臣、列侯、将军及其他军官依次站在西边，面朝东；丞相及其以下文官都依次站在东边，面朝西。九行人设有九个傧相，负责上下传呼。等到皇帝乘车子从后宫出来，侍卫官拿着旗子，传话叫大家注意，随即引领诸侯王至六百石的官员依次向皇帝朝贺。诸侯王及文武百官无不诚惶诚恐，肃然起敬。行礼完毕，按照新定的礼法摆酒宴。即便有资格陪侍皇帝的大臣也都叩伏低头，按官爵高低依次起身给皇帝祝酒。酒过九巡，司仪传令：“罢酒。”有御史负责全程监督，发现哪个不合礼仪，就把他拉出去修理。这样，从朝会到酒宴，没有一人敢大声喧哗，也没有一人敢失礼。对此，刘邦喜出望外地感叹：“我今天才真正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

刘邦龙颜大悦，当即提拔叔孙通为太常（位列九卿之首），赐金五百斤。对于叔孙通制定并执导这套礼仪，当时就有儒生不敢苟同，后世更是褒贬不一，颇有争议。司马迁的评价是：“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司马光则认为：“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

司马光的痛惜是非常深重的，生活在皇权专制时代，有些话他不能完全说出来。时过境迁，如今我们可以顺着他的思路一吐为快。毫无疑问，叔孙通推出成套朝会礼仪，最大的赢家无疑是刘邦，因为它强化了皇帝的权威，使他体味皇帝的尊贵；叔孙通及其团队也是赢家，因为他们既受到提拔重用，又获得经济利益。从此以后，叔孙通创意并执导的朝会礼仪成为保留节目，在历代王朝的宫廷不断重演，运行两千多年，对我国政治文化、民族心理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总而言之，至少体现如下方面。

君主被送上神坛，形成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威。上古时候，人们都是席地而坐，无论是君臣，彼此平起平坐，不存在谁给谁下跪。叔孙通创制这套礼仪，让诸侯王大臣向君主跪拜叩头，刻意拉开君主与臣子之间距离，将君主推上至高无上、无比尊贵的神坛。这种礼仪极大地阻隔君臣之间正常交流，使君主难以提升个人修养与能力。

群臣屈服于威仪，地位与尊严受到极大贬抑。宫殿内外戒备森严，唯有君主居高临下，所有大臣只能跪拜仰视，威风凛凛、咄咄逼人的气场，使君主显得神圣伟大，反衬大臣平凡渺小。刘邦虽然大肆诛杀功臣，好歹能让“三公”（司徒、司空、司马）坐以论道，给他们一点颜面。可是，自宋代以后，就是宰相级别的大臣也只能站着向皇帝汇报。到了明朝，又推出了“廷杖”的礼数，若是哪个大臣惹得皇帝不高兴，皇帝可以下令扒掉他的裤子，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屁股挨打。身为朝廷大臣，却遭受“打屁股”的羞辱，毫无做人的尊严。大臣地位与人格的降低，严重影响了中枢决策的效力，也助长奸佞迎合皇帝得势，从而为王朝衰微埋下隐患。

儒生向权力献媚获取富贵，树立恶性范例。在这种范例的引导下，没有人思考如何约束权力，更没有想到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尤其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思想领域几乎停滞不前，不能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涌现大思想家，故而在政治文明方面无所建树，只是在披着“礼治”外衣沿袭帝王专制，不断重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悲剧。当然，也有一些大儒意识到，将帝王请上神坛未必是好事。所以，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之说，试图借天象灾异来警示或约束帝王。这种思想可谓用心良苦，但对于一言九鼎的天子来说，并没有刚性约束力。

历史证明，司马光对叔孙通的批评颇为中肯。虽然他算是一名大导演，但本质上是一个精明的小人，无非是“趋一时之功”，以博得帝王的恩宠。

史 镜

二不尚书



范景文（公元1587—1644），字梦章，号思仁，别号质公，河间府吴桥（今属河北）人。明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官东昌府推官、吏部文选郎中、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范景文位高权重，二十六岁中了进士，并且随即当上了东昌府的推官。到天启五年，又升迁为文选郎中。



当时官员官风和社会风气非常不好。但是，范景文始终以名节自励，从不收受别人的贿赂，历史上说“苞苴无敢进其门”。



为杜绝纷至沓来的亲朋好友求他，范景文特地在府门上写下六个大字：“不受赐，不受馈”，故被百姓美称为“二不尚书”。

作者：大头兵动漫

廉政漫画